

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的 干部考核标准

□ 王 峰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个重要措施是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德与政绩在干部考核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政德的价值引领作用和政绩的正向激励作用，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德与政绩是干部考核体系的基本内容

政德与政绩是干部考核体系中的两个关键指标，共同构成了评价领导干部素质与能力的基本标准，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干部选任原则。

政德是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作风、廉洁等方面表现出的政治品质与道德操守，是从政履职的根本前提。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明确将“德”列为考核首要内容，要求“全面考核领导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具体包括政治忠诚、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廉洁自律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维度。政德的核心在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守公德，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公用权，服务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严私德，即修身律己，涵养良好家风，守住廉洁底线，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政德是党性原则的外在表现，只有党性坚强，政德才能端正，才能保证干部在复杂实践环境中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政绩是领导干部在推动发展、

服务群众、化解风险中取得的实际成效，是履职能力与担当精神的直接体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将“绩”列为考核重要内容，要求“全面考核领导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完成日常工作、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的情况和实际成效”。政绩的核心在于“为民造福”，既包括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显绩，也包括生态环保、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潜绩；既包括短期见效的具体成果，也包括打基础、利长远的战略成效。政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证明干部具备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能力和担当精神。

政德与政绩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政绩与政德统一于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全过程。离开政绩讲政德，政德将成为损害党的形象的空洞说教；脱离政德讲政绩，政绩将成为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只有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才能识别出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德是政绩的价值根基与方向指引。政德决定政绩的“价值底色”，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本质上是政德的外化。政德正，就会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能够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创造出符合人民需求的政绩；政德偏，利欲熏心、私念膨胀，就会产生偏差的政绩观，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同时，政德中的廉洁自律、规矩意识，是干部行使权力的“安全带”。领导干部只有严守政德，才能守住权力边界，杜绝“权力任性”，确保政绩创造过程合规合法，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坚持政德，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政绩是政德的实践载体与现实检验。政德并非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通过具体政绩体现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政德如何，最终要看他为群众办了多少实事、解决了多少难题、创造了多少经得起检验的实绩。群众对干部的政德评价，往往基于其创造的政绩。政绩是否真正惠及群众、是否得到群众认可，是

检验政德是否端正的“试金石”。现实中那些“老好人”与“太平官”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既无政德，也无政绩，与靠工作、靠实绩、靠人品、靠公认的政绩观相背离。

政德与政绩相背离是导致政绩观偏差的深层原因。在实践中，部分领导干部出现“重政绩轻政德”倾向，将政绩视为“硬指标”、政德视为“软任务”，认为“政绩突出就能一俊遮百丑”，从而在创造政绩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本质上是政德缺失导致的政绩异化。政德与政绩相背离，导致政绩观偏差，由此创立的“政绩”既损害了群众利益，也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用好考核指挥棒，就是为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提供用武之地，坚决不让这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激发全体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劲头和活力。

着力培养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的干部队伍

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的干部考核标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既修政德之“内功”，又出政绩之“实效”，实现“德”与“才”、“内”与“外”的有机融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在固本培元中筑牢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是政德的“风向标”。只有不断涵养政德，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才能防止政绩观偏差，避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急功近利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要深入学习其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检视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追求。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处理好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大力弘扬“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和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初

心使命，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在干事创业中发现和检验干部。政德好不好、政绩实不实，最终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一线、在服务群众最前沿见分晓。只有把“考场”搬到基层一线，把“答卷”交给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检验干部是否做到了政德与政绩的统一。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改革发展主战场、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作为检验政德与政绩的“试金石”。要在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信访维稳、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干部的政治表现、担当精神和实际成效，看其是否“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要加强对已完成的重大工程、民生项目进行跟踪问效，看是否存在“半拉子工程”和“历史欠账”问题，在时间沉淀中检验业绩和考核干部。

在制度构建中完善体制机制。制度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只有把政德要求嵌入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把政绩考核纳入科学发展轨道，才能实现“德”与“绩”在制度层面的有机统一。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鲜明导向，突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完善差异化考核办法。要全面考核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重点看政治素质和在工作实绩、把显绩与潜绩结合起来，防止“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对政德好、实绩突出的干部，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职级晋升中优先考虑；对政德失范、搞“形象工程”、弄虚作假、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的，坚决“一票否决”，依规依纪追究问责。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强化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划定价值坐标、明确实践路径。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以任期时间为边界、以个人升迁为导向、以短期成效为标尺的错误政绩观。这不仅偏离了党的初心使命，也妨碍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及时予以纠正。

“任期型”政绩观的表现。这种“任期型”政绩观主要表现为政绩上搞急功近利、政绩冲动等，他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仅直接造成资源浪费，而且扭曲用人导向、影响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将任期视为政绩产出的“截止日期”，追求“短、平、快”的显性成果，忽视需要久久为功的基础性工作。一些党员干部将任期作为工作的时间边界，只考虑任期内能够见效的项目，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性工作缺乏耐心。这种“击鼓传花”式的政绩接力，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还有个别党员干部出现了重显绩轻潜绩、重速度轻质量、重局部轻全局的现象，愿意建设看得见、摸得着、叫得响的形象工程，对那些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但管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缺乏热情。更有少数党员干部在面临一些解决起来费时费力、成本较高、要冒风险的老大难问题时，选择“新官不理旧账”，能拖就拖，甚至还会以纠错为借口推翻“旧账”。同时还表现为政绩冲动，有的党员干部在有限任期内急于干出政绩，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决策、大干快上。一些党员干部缺乏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凭主观臆断“拍胸脯”“拍脑袋”，脱离产业实际，盲目上马项目，有的地方不顾财政承受能力，违规举债搞建设，为一任政绩留下几代人的包袱。个别党员干部患上“创新焦虑症”，盲目追风口、抢赛道，什么热门就上什么项目，产生了创新冲动。这不仅造成财政资金和土地等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更损害了党的形象。

“任期型”政绩观的产生原因。党员干部党性观念存在偏差。党性是政绩观形成的价值原点 and 方向坐标，一旦党性不纯，就会导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生偏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如果党员干部背离了初心和使命，就会沉迷于追逐名利、滥用权力，将岗位视为个人晋升的“跳板”，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将政绩视为邀功请赏的“资本”，而非造福一方的责任。

党员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机制的科学性有待提升。考核是指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党员干部的行为取向。当前党员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虽然不断完善，但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仍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短期轻长期”，化解长期性、复杂性矛盾的重要性体现不充分等问题。部分地区或部门在设置考核指标时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实际情况，容易引发导向失灵、考核失真等问题。这些因素对于引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亟待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党员干部监督问责机制有待加强。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监督既能保证党员干部在正当范围内行使职权，也能防范政绩观出现偏差。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监督存在事前预防不足、事中跟踪不够、事后问责不严的问题。对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可行性论证有时流于形式；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跟踪问效缺乏深度；对造成损失的责任追究存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现象；任期的时间边界，容易沦为问责追责的“截止日期”。这些问题，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党员干部的急功近利倾向。

“任期型”政绩观的纠正路径。以党性教育巩固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只有坚强的党性才能有正确的政绩观。只有坚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以科学长远的眼光来谋划政事，才能实现

坚决纠治『任期型』政绩观

□ 孟涛 胡博闻

“任期思维”到“终身责任”的观念转变。增强党性，首先，要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引领作用。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时，要注意与“十五五”规划纲要等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把理论知识转化为价值纠偏的有力工具。其次，要在党性教育中加强对正确政绩观的培训引导。要常态化开设政绩观教育专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最后，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作用。既要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榜样作用，又要通过反面典型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让党员干部从成功案例中学经验，从失败案例中受警示，形成学有榜样、做有标尺、干有方向的良好氛围。

以完善政绩考核工作机制引领党员干部的价值导向。干部考核是对党员干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首先，考核工作机制要进一步突出新发展理念。政绩考核工作机制必须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合理设置阶段性工作目标与长期目标。其次，要优化考核指标体系。适当调整民生改善、生态效益、风险防控、基础研究等长期性工作考核中的权重，鼓励党员干部不仅要关注短期见效的显绩，更要着眼于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最后，要探索差异化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特点设置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让所有党员干部都能因地制宜、精神饱满地干事创业。

以加强监督问责健全预警校正机制。监督问责是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的保障，对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发挥着刚性约束作用。首先，强化日常监督，让偏离正确政绩观的行为无处遁形。及时有效的日常监督能够防止和纠正政绩观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避免政绩观的滑坡和松动。其次，加强对突出问题的监督执纪。要推动监督力量深度融合，整合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审计监督等渠道，紧密围绕任期制政绩观的突出表现和典型问题进行纠治，充分发挥纪律红线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行为的惩治功能。最后，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精准用好问责利器。在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党员干部严肃追责问责的同时，也要为那些敢于担当、默默奉献、长期耕耘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奋发有为，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为民服务。

(上接1版) 人类文明就是在人类的生产和思想活动中展开的，生产活动决定思想活动，思想活动引领生产活动。人类在生产和思想活动中所达到的自我解放程度，决定人类生产和思想活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思想以及知识生产所回应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是不同的。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的自我解放经历了从依赖共同体的存在到脱离共同体的独立个体存在的演变，前者孕育了人类古代文明，后者发展出了人类现代文明。在人类古代文明发展中，人类的思想以及知识生产始终围绕着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体的维系保全展开，形成了以构建人的信仰体系或以人的信仰体系为出发点维系保全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和知识生产。而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中，随着人的个体独立和自主、人以及人的理性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的思想和知识生产也就从信仰时代进入理性时代，思想的解放和理性的彰显催生

了现代科学技术、生成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是全面且快速的。工业革命及其催生出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历史必然方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方向，并形成了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以改造世界为使命、以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拥有主体地位的人民为中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是基于这个新体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走向科学，而由此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引领古老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确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天然是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和根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成就了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而

当代中国的发展则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开辟了人类发展新前景，并以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出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进入新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同时，还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数字文明时代的现代化，这将是与当年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西方现代化和代表成熟工业文明的美国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数字时代的出现，再次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和生态。可以预见，在数字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智能体的关系都将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这就意味着作为数字文明时代现代化发展先锋力量的中国，必须立足中国发展所引领的时代潮流，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视野、大关怀和大智慧，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究人类前所未有的大飞跃，扎实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智慧和知识力量。时势造英雄。身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革、突破与飞跃、再造与重塑的时代，正在繁荣发展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恰逢其时，既面临巨大的时代挑战，也面临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唯有抓住这个时代机遇，不断科学回答人类关切和时代之问，为人类进步提供新价值、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知识，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人类维度，本质上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关注人类、关怀人类、关切人类应有的思想气度和理论高度，由此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中国自主构建、让世界分享、服务全球、贡献人类的知识体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